

新时代财政体制改革： 新理念、新格局与新路径*

刘新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037)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形势任务要求，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作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出现“挑战”“风险”等词汇，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具有的高瞻远瞩的风险意识和应对风险挑战的时代担当。近年来财政政策不仅缓释了财政风险，并立足全局配合化解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风险。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微观主体面临重大挑战时，财税政策要助力科技创新、带动社会投资，避免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和失业率大幅攀升；同时要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异；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提倡厉行节约，以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话语权。

关键词：新时代；新理念；财政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3)09-013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3.09.005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①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形势任务要求，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②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政策制定、财政收支安排等都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在实现我党第二个

收稿日期：2023-8-4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环境政策效应的测度与评价研究”（批准号：19BTJ0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异质性影响及理论机制研究”（批准号：7200319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新波（1981—），女，黑龙江大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财政方向。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1(9)：4—17.

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8.

百年奋斗目标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新时代的中国财政承载着重要使命和任务。

已有文献详细梳理了新时代财政实践的创新,马海涛(2022)、吕炜(2022)、何代欣(2023)、马骁等(2022)总结了新时代中国财政的发展成就、基本经验和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优化方案。李华(2022)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制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朱青(2021)、程瑜(2022)、冯俏彬(2021)就新发展格局的财政体制改革做了系统分析,勾勒了财税改革的方向。既有研究对新时代财政做了系统的回顾和前瞻。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从新发展理念视角总结现代财政制度改革,探讨新格局下财政改革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展望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财政制度改革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改革背景下,改革的目标不同,财政作为改革的急先锋,所要承担的历史任务也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研判,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行动纲领,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经济稳定前行,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财政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实践上锐意进取,在理论上稳中求进,充分发挥了财政在治国安邦中的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本部分从五个方面系统回顾了新发展理念如何引领现代财政制度改革。

(一)以创新发展改革财税体制

为积极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创新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贯彻落实创新理念,财政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发挥财税政策对创新的引领和支持,另一方面要求财政体制改革稳中求进,在继承中与时俱进。

第一,财政通过调动自身资源,统筹各方力量,以“加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为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提供动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原始创新能力。^②采用先定后补的方式,引导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引导和杠杆作用,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③参股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支持战略新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初创期发展。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益性捐赠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基础研究,以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增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第二,财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要不断构建新机制以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以不断创新体现财政的先进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继而启动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解决了预算执行的“顺周期”问题,提高了财政政策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创新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创立了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不仅使财政资金快速下达至基层政府,通过备案审核、建立受益对象实名台账等环节又实现了资金供求的有效对接,并借助全

①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13-11-16 (01).

② 2012年到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1万亿元提高到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2012年的4.8%提升至2022年的6.3%。参见: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万亿元[EB/OL]. 中国政府网, 2023-02-24.

③ 2021年至2025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引导地方完善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分三批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这些企业发挥示范作用。参见:《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2021]2号, 2021年1月23日。

流程监控确保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高效性和安全性。进一步创新财政资源的统筹方式,“依法上缴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近年结存的利润”,并以转移支付资金的形式,通过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管理,快速精准地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帮助地方财政特别是县区财政缓解减收压力。与此同时,实施了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大力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通过提前退还尚未抵扣的税款实行“减税与退税并举”,2022 年直接为市场提供现金流约 1.5 万亿元,扩大了减税降费政策受益面,促进了消费投资。

(二)以协调发展平衡各方利益

平衡各方利益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财政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就是通过打破“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的传统体制,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体更多的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激发各利益主体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因此,调整既有利益格局,统筹推进财政各项改革,是释放经济潜能的必经之路,包括协调“央地关系”、激发市场活力和“让利于民”。

首先通过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动力。2018 年,在返还性转移支付中增设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以提高地方政府财力水平。2019 年,进一步将诸多专项转移支付改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事权转移支付项目,并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进行管理,并对央地共同承担的 18 项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做了明确的划分,同时界定了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权责更加清晰。2012—2021 年,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格局大致保持在 45:55 左右,实现了总体稳定,为中央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地方财政平稳运行提供了稳定的财力来源。

其次是通过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赋予市场主体新的活力。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减少重复征税,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持续推进增值税改革,实行税率减并,留抵退税扩围提速,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为鼓励科技进步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不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扩大所得税税收优惠覆盖面,加大优惠力度,进一步降低有效税率,减轻了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2013 年到 2021 年,累计减税降费 8.8 万亿元,有效支持了市场主体轻装上阵,市场活力持续激发,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是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让利于民,挖掘经济内生增长潜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对民生的投入逐年增加,将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全国财政支出 70% 以上用于民生。2012 年到 2021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支出增幅为 8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幅为 170%,卫生健康支出增幅为 173%,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大大增强。在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的同时,财政部门及时推进民生支出清单管理,以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注重民生政策措施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让民生保障延伸到未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三)以绿色财税助力生态文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①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公共财政提供的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部门综合运用财税政策,支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目前我国已经构建了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以资源税、耕地占用税为重点,以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等税种为辅助,涵盖资源开采、生产、流通、消费、排放全流程五大环节八个税种的生态税收体系。我国绿色税收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为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持。自 2018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9.

年环保税开征以来,万元 GDP 污染物排放当量从 2018 年的 1.16 下降到 2022 年的 0.73,降幅达到 37%,^①税收优惠对企业加大减排治污力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水资源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以及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制度。积极创新财政管理手段,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保治理。通过加大强制采购、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力度,从最初的采购清单到实施品目清单管理,不断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对社会绿色消费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有效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带动了相关绿色产业的发展。不断加大生态环保资金的投入力度,为落实中央财政“让项目等资金,不能让资金等项目”要求,生态环境部建成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中央财政针对水、空气、土壤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建立了专项资金,2022 年这四项资金共安排了 621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49 亿元,增长了 8.6%,^②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四)以开放发展建设大国财政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深刻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各国的广泛赞同和积极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六年被写入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决议,为如何践行多边主义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现代财政制度秉承开放的理念和思路,有效发挥多双边财经对话机制,不断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通过深化与传统多双边开发机构合作,加大全球发展倡议的资金投入,引导重要战略政策制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年来,我国在国际财金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多个转变:一是从以国际金融组织借款国转变为重要股东国和捐款国。维持亚行第三大股东身份的同时,力推世界银行股权和投票权改革并完成新一轮增资,将持股比例提升到 6.01%,向亚洲发展基金捐资 1.2 亿美元,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捐款 8500 万美元,支持亚投行、新开行业务跨越式发展,新增发展品种,扩大贷款规模,践行促进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宗旨。二是从国际金融组织参与者转变为创建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的重要倡议,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引导中亚学院高质量运营,与国际金融机构共同成立了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话语权。三是从以资金合作为主转变为更多地在制度、规则方面进行合作。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CAREC)等与“一带一路”倡议衔接。有效利用多双边开发机构资金和智力资源,支持国内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中的“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写入相关政策文件。四是从发展经验学习者转变为发展经验提供者。提升与多双边开发机构知识合作附加值。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联合举办高级别投资论坛,联合完成多个旗舰研究报告。借助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多期南南合作培训班和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班,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发展经验的国际传播。

(五)以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

共享发展理念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最大限度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只有更好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① 税收大数据显示,中国绿色税制“减污、利废、降碳”效果明显[EB/OL]. 中国新闻网,2023-07-28.

^② 今年共安排中央生态环境资金 621 亿元[EB/OL]. 生态环境部官网,2022-08-24.

好生活需要,才能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全社会充满旺盛活力和发展动力。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着力缩小个体收入差距,促进共享共建。

通过缩小个体收入差距,公平发展机会。“十三五”期间,我国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起征点、优化税率表、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和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此轮个税改革大大提高了税收负担分配的公平性。专项附加扣除优惠措施的实施,充分考虑了不同群体生活负担差异和个人发展诉求,符合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能够较好地体现个人收入的合理负担,增强纳税人的认同感和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更好地发挥个税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推动税负公平。2018年,建立实施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这是全面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步,2022年资金上解省份扩大到21个,在制度上解决了基金的结构矛盾问题,困难地区的养老金发放更有保障。至2020年底,各省份实现了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解决了省内地区间基金负担不均衡的问题。养老保险基本要素由中央统一管理,通过加强对养老保险政策、基金管理、经办服务、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统一管理,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以积极应对老龄化,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共建共享,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综合运用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鼓励支持引导东部高成本地区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在税费政策方面,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始终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营造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不断加大乡村转移支付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构建“钱随人走”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按照“钱随人走”的原则,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对吸纳搬迁人口落户多的地区给予财政支持。选择适合开展“钱随人走”制度改革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推动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服务对象精准挂钩。对普惠型基本公共服务,将按照提供服务地的户籍人口测算的方式调整为按常住人口进行测算;对具有特定服务对象的公共服务项目,将按照特定服务对象的数量进行测算,逐步健全上下贯通、有效衔接、层层联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长效机制。

三、新时代财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从需求看,我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有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我国商品零售额即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今后还有稳步增长空间。从供给看,我国基于国内大市场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大化发挥。”^①但是,深化供给侧改革依旧面临诸多挑战,技术“卡脖子”制约着新发展格局中主动权的把握,逆全球化制约着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生态文明的短板限制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享乐主义的滋生腐蚀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这要求我们必须运用科学思维,从战略的高度来准确认识和主动应对当前所面临的风险挑战。

(一)技术“卡脖子”的挑战

在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

^① 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 2022(9): 11-12.

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①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②

我国目前面临的技术“卡脖子”问题,由于其垄断性强,依赖国际贸易的跨国、跨链、跨企业合作难以实现技术转移和替代(陈劲、阳镇,2021)。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由于投入强度大、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和跨学科性强,仅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难以突破技术“卡脖子”的挑战。二是“卡脖子”技术不仅涉及市场主体的单一经济竞争,还涉及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性、国家的科技安全以及民生社会稳定,相较于一般的关键核心技术,其社会属性与国家公共安全属性更强(房宏琳、杨思莹,2021)。三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依旧相对匮乏,制约了产业链内创新链的形成与优化,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进程极为不利,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四是我国面临核心技术市场高墙困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我国关键技术的获取,如果我国不能通过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困境,将长期处于价值链低附加值区域,即存在“低端锁死”的风险。我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流失,通过市场行为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受限。(王金明、斯建华,2023)

(二)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些突出问题给世界安全和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③从根本上说,所谓“逆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冷战思维重新活跃,挑战了多边主义规则和包容性增长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反向制约了生产力的进步,造成全球变局。

从本质上看,全球变局是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结果。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助推保护主义,通过金融输血加放水、贸易和科技壁垒等手段,为本国企业和金融垄断资本保驾护航,资本主义国家为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而采取脱钩断供。在发达国家内部,这种“逆全球化”非但没有消解各种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利益分化,导致了社会撕裂。在国际范围内,这种“逆全球化”一方面通过矛盾的转移和转嫁,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遭受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动荡;另一方面甚至通过直接挑动对立对抗,造成了地区冲突和安全挑战,任其发展,只会加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足,各国采取关税报复措施,导致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企业投资受阻,就业机会减少,全球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被破坏,世界秩序和政治关系受到冲击。^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

(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⑤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

①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9-12(02).

②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J].求是,2018(6):4-6.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6.

④ 周嘉昕.“逆全球化”挡不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N].光明日报,2023-7-28(11).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①

社会主要矛盾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明显的总量不足以及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二产业 GDP 占比从 2005 年到 2020 年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 2021 年才开始小幅度的反弹。实体经济原始创新不足、核心技术和关键元部件受制于人的问题始终存在。二是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国土空间格局开发利用不充分,东部生态承载能力趋于极限,中西部和东北部仍有大部分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不足,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活力差异显著,进而加大了地区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失衡,限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能力,地区间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城乡二元体制依旧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主要还是以户籍身份制定相关的服务量和服务水平,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教育水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依然由于设施条件、师资力量、财政投入等资源分配方面的原因形成明显的差异。为此,人口、资本等要素在空间上非均衡流动态势明显。三是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平衡。2021 年,我国的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为 54.3%,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 15.9%和 38.4%;远低于 OECD 经济体 77.3%的平均值,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 18.3%和 59.0%;^②我国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仍较低。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不仅会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隐患,而且会导致投资效率逐年下降,企业债务风险上升。

(四)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文指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③“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④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一个过程,传统产业所占比重依然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尚未成长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能源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资源环境对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⑤。在以产业结构调整、行业节能和非化石能源发展为主要减排手段的前提下,短期内碳减排或对经济运行带来某些压力和挑战。二是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挑战。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造成不同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本有着显著差异。“双碳”将给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三是现行具有生态补偿内容的税费仅反映出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属性,普遍没有表现出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的关注,生态补偿的依据和标准难以形成共识。同时造成产权界定还不清晰,生态补偿受益方和受损方难以确定。四是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补偿范围较小、补偿标准偏低、补偿力度不够等问题凸显,尚未建立起资本市场资金、企业与个人资金等在内的多元化补偿资金来源。

(五)享乐主义带来的挑战

2021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

①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J]. 求是,2021(1):4-5.

② 也远低于 72.0%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 17.1%和 54.9%。2021 年中国最终消费占比 GDP 为 54.3%,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占比则分别为 82.6%、82.8%、76.9%、71.4%、75.3%、64.3%。刘洪愧. 为什么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不高[J]. 中国经济评论,2023(37):17.

③ 习近平.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 求是,2022(11):4-8.

④ 习近平.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N]. 新华网,2023-07-18.

⑤ 同④。

“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年轻干部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要一刻不停歇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断擦亮党的作风建设金色名片。^② 2023年4月3日,习近平又进一步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死灰复燃,一些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比如,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时抬头,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还任重道远;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③ 当今世界,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和消耗,已经开始造成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而享乐主义的肆意泛滥,势必造成奢侈性消费、超前消费、非理性消费的恶性膨胀,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使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更加紧张。这种与建设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的行为,必将给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造成巨大隐患,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④ 享乐主义滋长和蔓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滋生虚假繁荣的毒瘤,助长玩物丧志的风气,最终葬送已有的文明成果。人们都以享乐为人生目标,就必然会形成各自为已的风气,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久而久之,这样的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最终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以财政政策破解新时代面临挑战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⑤,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三大攻坚战之首;党的二十大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继续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近年来财政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缓释了财政风险,并立足全局配合化解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风险。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微观主体面临重大挑战时,应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措施,稳住市场主体,避免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和失业率大幅攀升;要通过专项债等财政工具扩大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及政府引导基金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科技强国战略中,财政政策要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11日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资金来源,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对开展基础研究有成效的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⑥ 科技创新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的

① 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3-02(01).

② 陆丽环. 100个月:一严到底[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2-01-28(004).

③ 习近平.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9): 4-7.

④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清除享乐主义之风[J]. 求是, 2013(9): 37-38.

⑤ 习近平.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 人民日报, 2019-01-22(01).

⑥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12(02).

制定逻辑。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力度,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合。要从资金链供给、人才培养和市场拓展等领域为企业解决后顾之忧,让企业更加专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链优化,以在短时间内帮助企业把握住行业变革的机遇。

一是将竞争机制引入到财政补助。财政补助重点不在于补贴特定企业,而在于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作体系,组建研发联盟攻克技术难关,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补助平台的选取应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遴选,鼓励公开竞争,激活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活力,选出最优解决方案推广实施;优先选择中小企业密集、升级潜力大的细分行业,科学验收转型成果进行补贴。

二是营造良好税收政策环境。实践已经证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有效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因此,可以考虑将加计扣除比例由 75% 提至 100% 的优惠政策扩大到全部科技型中小企业,进一步扩大普惠性政策覆盖面。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基于实质性创新的税收优惠机制,基于企业实质性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量、新产品数量给予优惠政策,而不过分依赖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或专利数量给予税收优惠。

三是着力支持基础研究。改革基础研究的评价机制、选题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强化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导向,突出其对应用科学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强面向行业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瓶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建立中央财政投入的增长机制,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方式加大研发资金投入,鼓励社会层面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的多渠道投入,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作体系,成立研发联盟攻克技术难关,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同时也要结合“放管服”,提高科研经费中的智力报偿占比,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学术自主权和经费支配权,为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创新研究提供支持。

(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挥财政“突破口”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为应对“逆全球化”危机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动力。要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构建从市场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稳定国内经济的基本盘也是稳定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循环的“底盘”。要努力扩大内需,在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同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逐步形成消费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有效投资,选好投资方向,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性金融等的作用,撬动和带动民间投资。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释放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所蕴含的规模经济巨大空间,进一步推动国内市场的高效运行。

二是要着力打通影响“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堵点,防止内外循环脱钩。构建双循环畅通的发展格局,要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和度,完善负面清单制度,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破除制约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参与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的建设,稳步推进对标国际一流标准,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与国际市场对接规则、协调规制,发展好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加大财税帮扶力度,提高中国企业打入海外高端市场和优质供应链的能力,提高构筑和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

三是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促进与沿线国家核心生产要素、区域优势资源、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合作,配套构建中国特色重点领域的治理框架,完善法律体系。比如说,做好对国际税收双支柱方案等在内的配套财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行,健全系统性风险的评估、防范、预警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特别注重对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短期“热钱”的

监管,统筹扩大开放与维护安全。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运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东盟与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协调,加大对全球发展倡议资源的投入,提升对全球重大议题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强参与标准、法律、物流、货币等领域国际循环支撑体系建设,特别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改革,倡导多元储备货币方案。进一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改革和全球税收治理,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多的机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多的活力。

(三)调节不平衡不充分,发挥财政再分配的作用

2022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①随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②

一是缩小群体之间的差距,赋予个人公平的发展权。根据目前直接税比重偏低的情况,应进一步完善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比例,逐步实现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过渡,更好发挥税收政策对个人减税的重要作用。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和标准,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在税收优惠和减税降费等方面,可考虑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小微企业予以倾斜,鼓励企业创新,降低企业在运营方面的成本,更好地提高就业率和劳动者收入。要加大对农民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既要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支出力度,也要改进在缴费、待遇领取等方面的制度设计,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差距。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标准,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重点民生领域做到精准供给,提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

二是继续优化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差距。完善一般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属于中央委托事权或中央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转列专项转移支付,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归并到均衡性转移支付,建立以均衡性转移支付为主体、以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为补充并辅以少量体制结算补助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科学设置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因素、权重,真实反映各地的支出成本差异,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确保财政资金配置更加精准、市县的财力保障更加均衡、各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更加均等。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规范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采取适当奖惩等方式,引导地方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到民生等中央确定的重点领域。充分利用自评成果,不断延伸监管链条,将绩效自评和资金监管深入融合,明确整改期限,对整改结果实施“回头看”的监督,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财政引导员的作用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是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形成良好互动。在此过程中,需要绿色财税政策的强有力支持。宏观层面,通过做好长期生态环境保护预算,有效支撑绿色发展体系建设。中观层面,通过生态补偿等转移支付手段,引领带动各区域共享绿色发展的成果。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 人民政协网,2022-7-28.

^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6.

微观层面,发挥绿色财政政策调节作用,通过财政资金奖补、加大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等措施,鼓励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同时,以绿色税收政策引领经济发展的绿色变革,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稳步推进。

一是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推动环境治理与经济收益相挂钩,做好中央财政资金的绿色转移支付安排,引导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市场化、多元化和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机制。对接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覆盖的重点地域范围,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节能生态补偿等多类型、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科学、合理、准确评估付出方为受益方带来的环境保护转化形成的生态价值,完善补偿资金的兑付机制。

二是加大绿色采购力度。逐步完善政府绿色采购需求标准体系,从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等维度确定产品规格,加大各级政府部门对于节能环保产品的优先采购力度,核定节能环保产品采购规模占同类产品的比例范围,有效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政府办公楼宇、公共服务场所等的建设中,拓展绿色建材使用范围,提升建筑的绿色环保品质。强化公务用车购置等重要领域的绿色采购需求管理,提高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品在同类采购中的比例。

三是适度拓展资源税的范围。在现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等税目基础上,逐步把资源税征收范围拓展至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兼具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地域范围,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和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经济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除了对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和尾矿开采实施资源税减免政策外,逐步探索税收减免的可扩围空间,对于主动实施矿产资源、水资源等循环利用的经营主体,以及从事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开发和供给的企业,可在税收减免、投资退税等方面予以一定支持。

四是促进税收的绿色化引导。继续通过消费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等,鼓励新能源汽车等环保交通工具的使用,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消费,通过税收引导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用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税收在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低碳降耗等行为中的正向激励作用。对于购置并使用的防污专用设备、绿色基础材料、废弃物再生处理设施等,研究并推行加速折旧政策。鼓励企业将税后利润用于环保领域投资,给予一定比例的退税支持。出台专门的税收优惠支持措施,广泛动员企业从事绿色化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的开发与推广,激发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新模式的市场活力。

(五) 杜绝享乐主义,发挥财政监督员的作用

各级党政机关要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带头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把钱省下来用于支持民生和市场主体,并以此作为国家一项长期方针政策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到,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是做好财政体制改革各项工作的客观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把过紧日子的要求切实贯彻和体现到财政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持续完善公务支出管理标准体系和规章制度,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强化督促落实,推动形成不敢、不能、不想铺张浪费的长效机制,勤俭办一切事。

一是严控一般性支出规模,建立健全“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审核机制,确保“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保持在合理水平。全面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硬化实化预算约束机制,严格按预算开支一般性支出,不得报销与公务活动无关的费用,将“三公”经费管理规则嵌入一体化系统,建立执行监控机制,防范无预算、超预算列支“三公”经费等问题。

二是从源头上完善制度建设。控制一般性支出不是一刀切做简单的减法运算,而是如何做到更加科学地优化支出结构。且要从更深层次去厘清支出范围和标准、精选项目,也就是要以部门

事权、事责清晰为龙头,以绩效为抓手,推进优化预算的各项基础性工作的改进。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发挥支出标准体系在预算管理中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逐步建立涵盖财政重点支出领域、主要共性项目和重大延续性项目的支出标准体系。

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和问责机制。对由于部门财务管理能力滞后、政策制度不理解的,要加强学习与培训;对预算管理体制还不健全的,要深化改革强化建章立制;对主体责任不到位、制度执行不到位的,加大追责与问责;对故意违法违规屡审屡犯的,要加大曝光力度,坚决予以查处。

四是坚持“人民财政”宗旨,提高认识上的站位。面对从“好日子”到“紧日子”的转变,政府各部门首先要提高认识,有大局观,在申请预算时要克服本位主义,克服保基数、占盘子的惯性思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预算运行并加强预算联网监督工作,各级审计部门严格审查预算执行过程并及时要求整改,各有关单位形成合力加强财务管理,保证“收支平衡”的实现,加大“三公”经费公开力度。

五、基本结论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①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本文系统回顾了这一阶段,财政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取得改革成就,首先是发挥财政再分配的功能,通过共享共建促进社会公平,同时配合税制改革,平衡各方利益,释放经济潜能;其次是发挥财政的引领带动作用,为技术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动力支持;与此同时,不断创新财政管理体制以应对新问题,以更开放包容姿态建设大国财政,提升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话语权。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②因此,基于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财政就务必要针对性地迎接和战胜技术“卡脖子”挑战、发展不充分不均衡挑战、逆全球化的挑战、享乐主义挑战、绿色低碳的挑战,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这意味着财政工作要做好预判,及时微调,要围绕着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以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和完善财政政策为工作重点,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提升服务全局的能力。尤其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是一场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楼继伟,2021),我们仍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资金直达机制是否常态化。2020 年受疫情冲击,基层财政支出压力骤增,为应对这种情况,实行了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要求新增加的财政支出全部直达市县。作为一种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有效提高了支付效率,但是并未同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调整相结合,因此,今后这一机制是否常态化,如何根据支出责任做一些分级支出的安排,怎样与事权调整相呼应都是关乎地方治理的重要问题。

第二,如何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和范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到 2035 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涉及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如何界定?尤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水平和支出压力如何协调?因此,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标准,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可回避的议题。

第三,如何协调“钱随人走”与区域发展差距。“钱随人走”制度改革是在过去发展型财政正常体系的基础上,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更加突出人的因素,切实解决依附在人身份上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问题,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效果和政策引导效应。但是对于人口流失地区,

^① 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2(8):4-9.

^② 同^①。

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较高和财政收入减少的双重困境,如何通过适当加大补助力度、设置保底补助等形式予以倾斜,以缩小区域差距,推进主体功能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第四,如何处理好产业补贴这把“双刃剑”。2021年至2025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可带动1万家左右中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效显著,但是采取补贴的方式支持产业发展,受到的诟病也较多,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也可能使企业对政府的产业补贴政策产生依赖情绪,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从而抑制企业活力和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因此,要调整产业补贴政策,建立遴选机制和淘汰机制,激励企业加快向市场求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海涛,彭章.近十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及政策亮点[J].财政科学,2022(9):5-31.
2. 吕炜,王伟同.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领域改革成就、内在逻辑与未来展望[J].财政研究,2022(9):16-34.
3. 何代欣.新时代中国财政发展成就、理论逻辑及政策优化[J].经济纵横,2023(3):80-86.
4. 马晓,王平,周克清.新时代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就与基本经验[J].2022(8):29-39.
5. 李华.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制改革的历程与主要经验[J].财政科学,2022(9):42-51.
6. 朱青.论“新发展格局”下的财税改革[J].财贸经济,2021(5):31-42.
7. 程瑜,张琦.新发展阶段财政支持扩大内需战略:理论阐释、现实约束和路径优化[J].地方财政研究,2022(7):4-11.
8. 冯俏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财税制度与改革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21(10):4-9.
9. 陈劲,阳镇,朱子钦.“十四五”时期“卡脖子”技术的破解:识别框架、战略转向与突破路径[J].改革,2020(12):5-15.
10. 房宏琳,杨思莹.金融科技创新与城市环境污染[J].经济学动态,2021(8):116-130.
11. 王金明,斯建华.数字技术跨国垄断、“卡脖子”困境与统一大市场构建[J].云南社会科学,2023(03):99-111.
12. 楼继伟.面向2035的财政改革与发展[J].财政研究,2021(1):3-9.
13. 刘洪愧.为什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高[J].中国经济评论,2023(37):16-20.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in the New Era: New Concepts, New Patterns, and New Paths

LIU Xin-bo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037)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nance has actively adapted to the situation and task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nd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role in suppor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Words such as “challenge” and “risk” were used many times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flecting the forward-looking risk awareness and responsibility to deal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In recent years, fiscal policy has not only mitigated fiscal risks but also coordinated and resolved a seri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s based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When the macro-economy is facing downward pressure and micro-entities are facing major challenges,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must help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e social investment, and avoid excessive economic growth and sharp rises in unemploy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further narrow regional, urban-rural, and group differences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igorously advocate a strict economy;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hrough share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New Era; New Concept; Financial System Reform